

论陶澍

岳麓书社

PDG

序

夏贊忠

陶澍是清代嘉道年间的名臣。当时，正是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夕。封建统治阶级日趋腐朽没落，农民起义连年不断，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侵入中国，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地主阶级中一些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举起了“经世致用”的旗帜，以匡时救国自许，主张面对现实，厉行改革，反对侵略，以寻求强国御侮的道路。陶澍“少负经世志，尤邃史志舆地之学。所至山川，必登览形势，访察利病”，提倡“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主张“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很注重实地考察，调查研究，按照实际情况办事情，因而较好地整顿漕运，试行海运，革新盐政，创行票盐。这不仅缓解了当时清王朝的财政危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人民的剥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陶澍在安徽和江苏，十分注意治河，主持修建了一系列水利工程。每逢灾荒，能去灾区了解灾情，组织救灾。为了推行经济改革，陶澍还采取了一些重商、用商、便商的措施，有力地促进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陶澍针对当时官场腐败的严重情况，特别强调整饬吏治，重视人才，选用贤才，且注重廉洁自持，以身率属。他给自己写的座右铭就是：“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他拔擢了一

大批卓越的人才，我国近代民族英雄林则徐、杰出的思想家魏源、著名的爱国将领左宗棠等都曾得到陶澍的提拔和重用。陶澍和林则徐一样，还是我国近代坚定的禁烟派，是主张“自铸银币”、改革币制的倡导者。陶澍不仅是政治家、改革家，而且学问根底扎实，在文学、史志、舆地、教育诸方面也有着较深的造诣。当然，作为封建士大夫，作为封建统治者的一员，他不可避免地有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对此，我们也不能忽略，需要很好地加以分析和研究，以摒弃其封建糟粕。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研究总结。江泽民同志在国庆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科学文化事业。要积极吸收我国历史文化和外国文化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坚持摒弃一切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糟粕和精神垃圾”。他还特别强调：“当前在这个问题上，要特别注意反对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思想”。要贯彻毛泽东、江泽民同志上述指示的精神，我们就应该认真地开展对我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开展对我国历史人物生平事迹及其思想的研究。陶澍是我国古代史后期一个著名的政治家，也是我国近代史破晓前有名的改革家。他的重大功绩和思想，他的道德和文章，在我国历史上有着不容忽略的地位。然而，由于他是历史转折时期的人物，长期以来，对他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过渡时期的人物尤其是重要的历史人物，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更具有研究价值，我们今天开展

对陶澍的研究，就是要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进一步落实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活跃学术空气，批判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

开展陶澍的研究，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要把陶澍这个历史人物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去研究，如实地评价其功过是非，既不能溢美和拔高，也不能苛求于前人。在研究过程中，见仁见智，角度不同，侧重面不一样，见解不一致，这是很自然的。希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通过充分讨论，通过长期深入的研究，求得比较全面的、正确的、接近一致的认识。

我们研究历史，研究历史人物，并不是为历史而历史，为研究而研究；而应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通过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吸收我国历史文化中的一切优秀成果，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近几年来，一些史学工作者循着这个方向，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对陶澍生平及其思想的研究方面，也开始取得初步的成果。如益阳师专整理标点了《陶文毅公全集》，编著出版了《陶澍年谱》，还在省内外的刊物上发表了一批研究陶澍的文章；省社会科学院、湖南师大文史所、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的同志撰写了一些有关陶澍的论文；安化县在保存和搜集陶澍文物资料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这是值得肯定的。

1989年10月，正值金秋收获季节，湖南省社科联、湖南省历史学会、安化县政协、湖南省文史馆、湖南省书院研究会、湖南师大文史所、益阳师专、安化人才研究会联合发起，在陶

澍的家乡安化召开了陶澍逝世150周年学术讨论会，北京、南京、沈阳、武汉及省内的许多专家、学者带了一批质量较高的论文与会，《论陶澍》一书即是从这些论文中选辑而成的。它的出版从一个侧面反映省内外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繁荣学术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情况，对于交流陶澍研究成果，开展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特为之序。

目 录

序	夏赞忠	(1)
略论陶澍	陶用舒	(1)
陶澍的历史业绩	林增平	(19)
卓越的政治家改革家陶澍	陈光崇	(26)
陶澍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影响	刘泱泱	(33)
略论陶澍的胆识和才干	黄一俊 刘仲书	(41)
陶澍在两江地区取得政绩的原因	李少军	(47)
陶澍治理江南的特点	陶 今	(60)
陶澍的漕政改革	夏 眇	(67)
试论陶澍创办清代海运的历史功绩	熊源滂 梁小进	(73)
评陶澍的《敬陈海运图说折子》	张舜华	(83)
陶澍的盐政改革	仇文农	(88)
陶澍在治水救灾中的勤勇精神	常少强	(97)
陶澍与近代地主阶级经世思潮	王开玺	(100)
陶澍的实学思想述评	王兴国	(121)
论陶澍的务实精神	周作翰	(133)
陶澍经世之学探源	夏石斌	(141)
陶澍伦理思想简析	尹绍安 罗庆康 丁 宋	(149)
陶澍吏治思想初探	丁平一	(157)

陶澍“重商”思想评析	蔡泽华(168)
陶澍熄宰熄盗耕牛的思想	曹守民(176)
陶澍学术成就述评	陈 沈(179)
陶澍的陶渊明研究	王一鹤(194)
陶澍文化群体研究刍议	石彦陶(216)
略谈陶澍诗歌的思想性	文光明(229)
关于陶澍诗歌之我见	王文彬(235)
陶澍的书院教育思想	陈海波(239)
陶澍主讲澧阳书院考评	杨布生(247)
试论陶澍的人才思想和实践	谷 茂 黎安仁(257)
陶澍人才思想浅析	朱汉民(266)
楚材之盛第一人——陶澍	郭辉东(273)
陶澍与魏源	李育民(279)
陶澍与左宗棠	罗文华 丁冰玉(290)
纪念陶澍逝世150周年学术讨论会述评	何鹤志(298)
陶澍著作纪略	刘志盛(310)
陶澍生平大事年表	彦 舒(318)
陶澍家乡小淹故居	杨健民(333)
跋	李楚凡(337)

略 论 陶 澈

陶用舒

陶澍生活在清嘉庆道光年间，这是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夕。封建统治阶级日趋腐朽没落，农民起义连年不断，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侵入中国，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地主阶级中一些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以匡时救国自许，逐步形成了以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为代表的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集团。陶澍就是这个集团前期的领袖和核心。研究陶澍，剖析他的政治经济思想及其实践行动，对于了解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研究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思潮，都有积极的意义。

(一)

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的统治者已经不能和清初一样，对全国实行严酷的封建文化专制统治了。梁启超说：“嘉道以还，积威日弛，人心已渐获解放”，知识分子可以“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计”。①他们要求摆脱传统经学的束缚，而转向“经世致用”之学，主张“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②，开始面对现实，揭露时弊，关心民生，锐意改革。

敢于面对现实，批评封建弊政，是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政治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陶澍政治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漕运、盐务、河工、荒政等诸多方面，陶澍对封建弊政进行

了猛烈抨击。他说“江苏漕务疲敝已久，在闾阎则每苦浮肿，在州县则又患刁抗”。各地官吏与土豪劣绅、衿棍、生监勾结包漕，横索陋规，吸吮“乡里穷黎之膏血”^③，化国家钱财为己有，小民之负担日重。他还指出，各地河工官员皆有“染指图利之心”，“白吃干分，甚至克扣工价，侵肥入橐。”因而“百弊丛生”^④，致使“国家数百万有数之钱粮，填无底之河”^⑤。陶澍对盐政的弊病，也有深刻的揭露，指出把持盐政的官吏、总商，“并不行盐，徒为盐务之蠹”^⑥，其中，两淮盐务更是“弊端百出”，到了“山穷水尽不可收拾”的“决裂之势”^⑦。特别可贵的是，陶澍敢于革除弊政，同腐败官吏作斗争。他兼理两淮盐政时，竭力整顿，在淮北创行票盐，革除总商对盐政的垄断。当时，把持盐政的官吏和朝廷大员勾结，利用各种势力，对陶澍施加压力，大肆攻击，一方面向清廷诬告陶澍，企图利用皇权将其赶下台；一方面大造舆论，造谣中伤，甚至“相斗纸牌，绘一桃树，另绘一人为伐树状，以寓诅骂”^⑧。

陶澍对封建社会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对社会危机和衰败政治的揭露。虽然这种揭露是局部的、表面的，并没有击中要害，而且从陶澍的主观动机上说，不是否定封建制度，相反，正是为了加强封建制度，巩固封建秩序的。但是，这种批评仍然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陶澍出身低微，从小生活贫困，进入官场以后，比较重视人民生计。每逢灾荒，能深入灾区了解灾情，采取各种措施，组织救灾。在安徽，他曾带头捐银三千两；在江苏亦曾“率属

捐廉倡济”灾民。同时，他关心生产，“劝施籽种，以备耕植”，“收牧牛只，以备春耕”^⑨。他又非常重视水利建设，认为农田水利是“覆育苍生”的大事，能使“舟楫畅行，旱潦无虑，民生永资利赖”^⑩。因此，他“以农田水利为国计民生要务，专意讲求”，先后在苏、皖主持修建了一系列水利工程，有人称赞他“控制江流包左右，兴修水利普东南”^⑪。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

陶澍关心人民生活，把民众“有食”放在首要地位。为京官时，他创议在朝阳门外设“悦生堂”，“收养老病残疾百余入，衣之、食之、字以庇之”^⑫。抚皖时，创“丰备义仓”，“以丰年之有余，备荒年之不足”^⑬。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江苏大水，陶澍、林则徐为民请命，“得旨缓赋，并设法劝捐赈济”^⑭。陶澍还强调整节约，认为“饥民一日得米三合，可以不死”，号召节省筵宴、交际、土木、簪珥、衣被等费用“以活人”^⑮。作为一个封建官僚，多少能考虑人民的利益，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二）

陶澍长期任职的两江地区，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人和市民阶层的力量在不断壮大。这种客观环境，促使陶澍对商品经济和商人的作用有较多的了解，能够提出一些比较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经济主张和改革措施，因而成为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前期的代表。

嘉道年间，清王朝的财政经济陷入困境，特别是河工、漕运、盐政等问题成堆。陶澍在两江大力兴利除弊，推行改革。道

光五年（公元1825年）。陶澍调任江苏巡抚，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视察漕运。随后，一方面大力整顿漕政，严禁邦船加索津贴，禁止刁劣包漕，将“衿棍陋规痛行裁革”^⑯；另一方面，积极推行漕粮海运。第二年，陶澍在贺长龄、魏源、包世臣等人协助和筹划下，决定苏、淞、常、镇、太仓之漕粮改为海运。共组织沙船1562只，运米165万余石到达天津，受到时人称许，认为是“利国、利民、利商，为东南拯弊第一策”^⑰。创“东南数百年之惠，国家亿万载之利”^⑱。清代盐务，基本上延用了明代纲盐制。嘉道年间，纲商与官府勾结，形成封建垄断性的官僚盐业集团。他们把持盐政，贪污中饱，致使盐价上涨，盐产下降，官盐停滞，盐课短绌，既加重了人民负担，又严重影响了清王朝财政收入。陶澍兼理两淮盐政后，提出整理盐务章程十五条：“裁减浮费”，“删减窝价”，“删改繁文”，“慎重出纳”，“裁选总商”，“整顿纪纲”^⑲等。同时，在魏源、包世臣的协助下，在淮北创行票盐。所谓票盐，是在盐场设局收税，任何人只要照章纳税，均可领票采盐运销。票盐的实行，一些“挂名总商率多坐食盐规之辈”多被革退，“从前之每年坐食千金数百金者”，均“干俸全裁”^⑳。朝廷的盐课收入，则有了保障。当时，人们认为“票盐之功，不特再造淮北，抑且惠及淮南。匪惟救一时之弊，洵足延百世之利也”^㉑。票盐改革的成功，使中国盐法从此有了新的变化，商人力量加强了，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在盐业领域内出现。陶澍兼理两淮盐政八年，共“完银二千四百万四千余两”^㉒，这对于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无疑是打了及时的强心针。

重视和依靠商人的力量，是陶澍推行改革的明显特点。他力图正确处理农业和商业的关系，正确认识生长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正确对待发展中的商人阶层，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重商”、“用商”、“利商”、“使商”的思想和政策。海运漕粮的沙船帮，就是带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人集团。“大小沙船，江南沿海州县皆有，殷实之商，有一家数十号者，会于上海”^{②3}，海运的成功，就是依靠了这个商人集团。海运的进行，又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流和物价平抑，使商业资本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陶澍对盐政的改革，实质上是变盐业官营为私营，实行盐业的自由贸易。史载：实行票盐后，“人知其利，远近辐辏，盐船衔尾抵岸，为数十年中所未有”^{②4}。可见，票盐得到了商人的普遍欢迎。陶澍在利用商人的力量时，比较注意商业活动的客观规律，保护商业活动的正常开展。如允许“沙船行往自由”，领票运盐商人，可以在价格、捆运、销售地区等方面自由竞争；三令五申，不许“文武衙门，私设陋规”，“向民贩索取”^{②5}；动员商人运米灾区，规定“免其关税”，“听其自行投行，照时价公平粜余”^{②6}；并告戒“不逞之徒”，不得对商人“截阻留难”，“拦截强买”以及“纠抢”^{②7}，否则严惩；对海运漕粮途中因意外事故而造成的“短缺米石”、“伤弊人口”，规定“免其赔缴，并照例抚恤”^{②8}。陶澍不仅注意了商人的经济利益，而且开始注意商人的政治利益。他制定了“商船奖叙”^{②9}条例，对海运有功商人分别给予五品到九品职衔、顶戴，从而为商人争得了政治地位。

清朝实行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到嘉道年间，出现了严重

的白银危机。一方面，银钱比价失调，银贵钱贱，原定纹银一两抵制钱一千文，由于“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⑩；另一方面，鸦片走私，洋货流入，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在这种情况下，陶澍、林则徐联合提出了改革货币的主张。首先，他们认为“银钱贵在流通”；其次，反对禁用洋钱和骤平洋钱价格，但需逐步限制洋钱流通范围。再次，坚持以银为币，提出了自铸银币的主张。“欲抑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每枚以纹银五钱为准，轮郭肉好，悉照制钱之式”^⑪。陶澍、林则徐改革货币的主张是进步的，是反对西方经济侵略、维护民族经济利益的爱国之举。

(三)

嘉道年间，随着封建统治危机的加深，吏治更加腐败。陶澍对官场腐败现象极为不满，力主革新吏治。他认为“各省州县，铜弊日深，皆由该管上司不能正己”，因而各级官吏“作威作福，不公不法，横索属员”，“其于百姓则鱼肉也，百姓视之亦几虎狼也”。因此，他主张各省大吏应“正本清源，以身率属”^⑫，以肃吏治，以厚民生。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陶澍接任江苏巡抚后，即对各县官吏进行调查，认为“才猷超出者颇少”，而且“进阶太杂，既难免无幸进之辈滥厕其间。始基未立，安望其留心民事，有益地方”^⑬。因此，他向道光皇帝提出，必须整顿吏治，使州县“得人而理”。

陶澍以勤政廉洁著称，其座右铭是：“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⑭。兼理两淮盐政后，他不要兼职的俸银，认为“本任总督，养廉已极

优厚，所有盐政养廉五千两，应行恭缴”^⑤。在他的带动和督责下，裁革盐政衙门浮费每岁16万两，所省费用，大都用于公益事业。主持海运，费用仅半，结余的一部分，就用来重建苏州尹山桥。史称陶澍“服官数十年，起居如寒素”^⑥。陶澍病逝，淮商感其“清德”，以白银40000两为赠。夫人黄德芬认为陶澍生前不受人赠金，“不可以死后污吾夫子，却不受”^⑦。

陶澍对自己要求严格，根据“一日三省吾身”的古训，设立《省身日记》，“每日灯下于日间所见所闻所言所行，皆走笔记之。其事有不可对人者，必不可对天，涉笔之际，宁免忸怩，即可缘以自考，庶几寡尤寡悔，不致为下流之归。其无事之日，则空一其处，俾将来翻阅，知此日即为虚度放旷之身，聊以此为检摄之具”^⑧。陶澍不惮劳劬，注重调查研究。巡中城，“以十月而结八百余案”；巡南漕，“以半载而办五百余万石之米”；掌吏科，“案牍如鳞，亦以一手治之，未尝假之书吏”^⑨。他在厅堂撰联自警：“绕案风清，尘境扫除吏牍；举头日近，光明洞照吾心”^⑩。史称：陶澍，“奏议下笔千言，无能代其草者”^⑪。他视察验收吴淞江水利工程时，仅“一肩舆，从者数辈”，“时下舆，杂众中徒步，见父老绅士，辄揖而慰劳之，详询风土民俗备至”，“至坝所，亲以水尺量坝内外”^⑫。陶澍不仅勤于自己动手，而且要求下属认真办事。他在指挥救灾放赈时，要求各级官吏，“户必亲到”，“口必亲点”，要求“将一庄内所有极、次贫花名户口及应领银数开写榜示，粘贴庄前”，以防“舛错”^⑬。

陶澍勤政清廉的作风，受到百姓的欢迎。嘉庆二十五年（公

元1820年），他调离川东，“阖郡士民攀辕祖饯，夹江两岸，十余里不绝”^⑭。左宗棠曾为陶澍、林则徐建祠，称其“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诚不朽”^⑮。齐彦槐在悼陶澍的挽联中，亦称其“以宽厚孚民望”，一生“为畿辅急粮储，为东南兴水利，拯灾黎，化枭徒，恤慈孤幼”^⑯。正因为陶澍为百姓做了一些好事，四川、江苏、上海、安徽、湖南等地，至今还流传着不少“清官陶澍”的故事。

（四）

热爱国家民族，抗御外国侵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地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曾继承和发扬了这种传统，陶澍就是如此。陶澍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爱国志士，有着一种特别的崇敬之情。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陶澍第一次离湘进京，途经河南汤阴，特意拜访了岳飞祠庙，并写下了盛赞岳飞爱国精神、痛斥投降派的诗篇：“坏壁剗苔石碣存，英雄寂寞恨难吞。十年枉洒孤军血，三字难成万古冤。高庙无心图北伐，王师有力市中原。可怜桑梓庭前树，留得南枝见旧痕”^⑰。抒发了他钦仰爱国英雄人物、立志报效国家的情怀。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清廷平定英国煽动和支持的张格尔在南疆的叛乱，收复喀什噶尔等四城，巩固了祖国边防。陶澍闻讯后，欣喜异常，吟诗称贺：“异域神犹摄，同仇气自生。游氛戈壁扫，草木亦天兵”^⑱，表现了他维护祖国统一的政治抱负。

陶澍在两江任职的10多年，正是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时刻。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向中国输出商品，特别是大量鸦

片，使中国民病国贫；另一方面，又积极策划，准备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英船阿美士德号在沿海一带进行间谍活动。陶澍估计英船内可能有鸦片等违禁物品，并有可能制造事端，因此，令水师将英船“三面迎住，使之不得近岸，兼断其驶北之路。同时严禁沿海小船，毋许接近夷船，以防暗地销售夷货，并令沿海多备巡船押护”^{④9}，最后将英船驱逐出境。为了防止西方列强的侵略，巩固海防，陶澍又制订了《巡洋会哨章程》，对沿海部队的驻防地区、巡查时间、兵力配备、奖罚制度等，都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他特别提出要加强士兵的训练，要求各级将官“督率弁兵随时训练，使其技艺娴习，不畏波涛，且豫识风沙、水线。一旦随同巡哨，自能驾船下海，若履平地，近可以缉盗捕贼，远可以威慑外夷”^{⑤0}。

陶澍和林则徐一样，是坚定的禁烟派。他认为，“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⑤1}。“吸食鸦片之人，酖毒妄安，久或废物”，鸦片“不但耗天下之财，且伤天下之元气”^{⑤2}。因此，他力主严禁鸦片，并向清廷提出禁烟八策：“劝戒烟引，宜刊方、施药并举”；“烟具烟土宜分别毁缴”；挑选教官，广为宣传教育；“审查烟案，宜确审速办，以免反复”；“查办烟案必须本官亲自督拿”；“兴贩鸦片宜加重罪名”，首贩者应斩决；“纹银出洋应分别加重严办”^{⑤3}。陶澍不仅制定了严禁鸦片的具体措施，而且身体力行，在辖区严禁鸦片走私贩运，收缴烟具烟土。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陶澍在江苏毁大批烟土，成为震动朝野的大事。

(五)

陶澍在学术上也有值得称道的成就。潘曾莹评价说：“大贤杰业在匡时，余事风骚亦我师。安石经纶天下望，希文怀抱圣人知。要凭柱地撑天手，写尽驱山障海奇。著作千秋期不朽，扫除凡澁铸雄词”^⑯。陶澍一生忙于政事，除大量奏疏外，还著有《印心石屋文抄》、《陶桓公年谱》、《陶渊明集辑注》、《靖节年谱考异》、《谈瀛录》、《运碧斋词谱》等，编辑和校刊了《海运全集》、《重浚吴淞江全集》、《云台新志》、《皖藩政要》、《吴中唱和集》等书。陶澍对历史、地理、文学、哲学、教育以及算术、音乐等，均有独到见解。魏源称陶澍：“少负经世志，尤逮史志舆地之学”^⑰。陶澍对中国历史有精深的了解，特别对考据、谱学、地方志方面有深入研究。朱自清对陶澍的《靖节年谱考异》评价甚高，认为“旁征博引，辨析精详，其所发明，尤在出处一事。谱首论世系，亦甚周悉”，“断语独创一解”^⑱。陶澍对谱学十分重视，仅在《陶文毅公全集》中，所收谱序达27篇之多，而且细考姓氏渊源，具有学术价值。在安徽时，陶澍创修省志，平时“留心文献，于地形水利尤究心”^⑲。对长江三峡、金沙江源流、江汉地势、湖南三湘、蜀中四河、九江变迁等，均有详细考证，有理有据，自成一说。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陶澍主持四川乡试，途经河北、山西、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等省，著有《蜀游日记》四卷，对沿途道里远近、山河形势、攻守战备、地理沿革、风俗民情、物产古迹，都做了认真的考察和记载，得到时人的赞誉，至今仍不失参考价值。